

STUDIA
HISTORICA
MONGOLICA

蒙古史研究

第十一辑

中国蒙古史学会 编

科学出版社

蒙古史研究

第十一辑

中国蒙古史学会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由中国蒙古史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全书收录学术论文17篇，视角新颖，内容丰富。利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等多语种史料，对北方民族史和各个时期蒙古历史文化的诸多课题进行了论述。

本书适合于从事民族语言、历史、宗教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史研究. 第11辑 /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03-039356-2

I. ①蒙… II. ①中…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IV. ①K28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7530号

责任编辑: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字数: 400 000

定价: 9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蒙古史研究》编委会

主 编

乌云毕力格

副 主 编

苏德毕力格

编 委

(按汉语拼音排序)

宝音德力根	黑 龙	孟松林	齐木德道尔吉
苏德毕力格	魏 坚	乌 兰	乌云毕力格
乌云格日勒	叶尔达	张 帆	张永江

以本辑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

本辑的出版得到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资助

目 录

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创造者——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	刘迎胜 (1)
《元朝秘史》文献学研究史概述	乌 兰 (7)
17世纪上半叶满蒙汉文档案在蒙古史研究中的应用：以内蒙古大学清初蒙古史 研究为例	齐木德道尔吉 (21)
回鹘王子葛啜墓志鲁尼文志文再释读	白玉冬 (45)
Die Schlacht von Wahlstatt bei Liegnitz und die Mongolen	Michael Weiers (53)
“额勒只带”史实再辩	高建国 (61)
《至正条格》文书解读研究	宫海峰 (71)
乐实小考	额尔敦巴特尔 (87)
元代水军训练及军事科技教育	王风雷 (91)
读1431年木刻版畏吾体蒙古文佛经序与跋——兼论古蒙古语语音向近代语音的 过渡	乌云毕力格 (101)
明代中国与内陆亚洲——以16世纪明朝—瓦剌关系为重心	特木勒 (116)
扎鲁特蒙古昂罕系统进入清军八旗始末研究	白 莹 (125)
雍正前期喀尔喀的土尔扈特旗（蒙古文）	那楚克多尔济 (131)
九世班禅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访问经历及奉天当局的应对——围绕蒙、藏、民国 三方关系之事例而论	李儿只斤·布仁赛音 (168)
日本による東部内モンゴル植民地統治確立の政策過程——興安東分省の設置 をめぐる区域再編・移民政策・民族闘争を中心に——	胡日查 (186)
内モンゴル東部における初等教育政策の成立と展開——1930-1940年代 を中心に——	娜荷芽 (211)
宗族观念与民族意识的交错与融合——围绕中国汉地木华黎后裔事例	谢咏梅 (228)

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创造者

——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

刘迎胜

（南京大学）

850年前，即1162年，正当蒙古部与塔塔儿部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激战时，蒙古部中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婴儿呱呱落地，它就是后来中华民族的英雄、世界的伟人——成吉思汗。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是蒙古部的一位首领。在当时的蒙古草原的周围，有许多强大的国家和显赫的统治者，如与蒙古人比邻的金，其统治者被蒙古人称为Altan Khan，即“金主”“金汗”；为避金人兵锋而从中原南渡、重新建都于临安（今杭州）的南宋，蒙古人称之为“蛮子”，或“南家”；在河西有自称为“白高国”的西夏，蒙古人称为唐兀或沿用汉称“河西”；在中亚的天山东段南北，有唐末自漠北迁来畏兀儿，即回鹘；在以碎叶川（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交界处的楚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有辽亡后契丹残余势力在此建立的西辽，蒙古人为哈刺契丹，其统治者称为古儿汗；在西亚，有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政权；在东欧，有以基辅罗斯为首的俄罗斯各公国；在欧洲，有教皇的势力与十字军联盟。

上述这些王国和政权中，可以说随便哪一位王公、君主的儿子，都要比这位名叫铁木真的刚诞生的婴儿要高贵，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与日后发展的条件都要比铁木真不知优越多少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铁木真同他们相比，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但历史却最终证明，英雄不问出身。850年过去了，今天全世界人民传颂的不是上述这些王公、君主的王子们的故事，而是成吉思汗的名字和他的业绩。那么，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来评价他和他所创造世界的新时代？作为一位研究蒙元代历史的学者，我想借此机会谈以下几点想法。

一、个人和家族命运的改变

我们先从成吉思汗赖以起家的蒙古部说起。铁木真出身于蒙古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直系五世祖父屯必乃、四世祖父合不勒，均曾为蒙古部的汗。但至祖父把儿坛时代，

其家族已经被排挤出蒙古部核心阶层圈，部落的权力为屯必乃的叔父察剌孩领昆的后裔泰赤乌氏族所控制。铁木真幼年丧父后，其家庭迅速中落，不但时常受到泰赤乌氏的欺凌，后来蒙古部移营时连其父的属民也抛弃了他们而迁走。这时其全家包括也速该长妻诃额仑夫人与她所生的4子1女，次妻所生2子共10口人和家中仅剩的一名女仆，财产只有9匹马。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夫人像所有普通的蒙古母亲一样，为抚养孩子，做一切能做的事。蒙古草原丰富的物产为他们提供了衣食之源。她亲自采摘野果，挖掘野菜。少年时代的铁木真也曾带领诸弟渔猎。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活变迁和苦难，成为铁木真改变家庭命运，重振家业的最直接动力。

当时的大漠南北，诸游牧部落之间为争夺牲畜、牧场与人口攻战不休，而各部内的贵族也在为争权夺利内争不断，而下层牧民则困苦不堪。群雄割据的乱世，为草原英雄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能的舞台。铁木真依靠蒙古部中旁系贵族札答兰氏首领和札木合比邻的克烈部和首领王罕的帮助，重新掌握了武力，在先后打败了蔑儿乞部与控制蒙古部的泰赤乌氏之后，其家族重新崛起，而铁木真本人也被推为蒙古部的汗。

二、民族命运的改变——蒙古民族的形成

蒙古草原是游牧帝国的摇篮，两千多年来，猃狁、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先后在这里称雄。在唐末至12世纪中叶的300年中，这里诸部相争，没有再出现强大的游牧政权。而年青的铁木真经过“十三翼之战”，统一了蒙古部；利用金兵北征之机，联合克烈部王罕，击败了控制蒙古高原东部的宿敌塔塔儿部。这样，以呼伦贝尔为中心的丰饶草原，与生活在这片辽阔土地的各部人力物力就完全听命于铁木真调遣，为他后来建立蒙古帝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击败塔塔儿部之后，整个蒙古草原三分天下，铁木真已有其一：他的主要对手只剩下居于漠北草原中部的克烈部，与控制杭爱山以西的乃蛮部。在灭亡克烈与乃蛮之后，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其疆域东起今大兴安岭，西抵今新疆额尔齐斯河。蒙古国的建立是大漠南北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此前蒙古草原上诸游牧部落各有名号，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蒙古国建立后，铁木真受称号成吉思汗，其治下诸游牧部落均成为蒙古属部，采用蒙古作为共名——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蒙古民族的命运从此改变。

三、国家命运的改变——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事业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不仅意味着国民的多元，也包含各民族均参与国家的重大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国历史，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到元朝的约900年时间内，经历了各北方民族入居中原，数度建立地方性政权，到最终建立疆土包括全中国在内的王朝的过程。而蒙古国的建立，是这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环节。

东亚大陆从整体来讲,可区分为受西太平洋季风强烈影响的南部农耕区与高纬度、降水较少的森林—草原地区。北方草原与南方农耕区之间的毗邻地理位置,使数千年来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演绎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大漠南北自古是汉地战马的主要来源,草原所出产的皮裘、牲畜也为汉地居民所需。而汉地所产谷物、茶叶则是草原牧民重要的食物;金属品、陶瓷器皿与各种手工业品与药物,也是汉地输向草原的传统商品。

从土地承载能力看,草原地区的人口远少于农耕区,整个大漠南北所有游牧部落加起来,其人口往往也抵不上汉地一个州郡。在这种人力资源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草原游牧政权赖以与汉地王朝相对抗的,是其全民皆兵的动员制度和军事力量流动性。双方的军事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原王朝视兵者为国之大事,将军事行动作为系统工程来处理;且不说征集兵员、补充装备需长期准备,单是准备给养,便是任何一位统帅也不敢忽视的头等大事,即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游牧民自幼生活在马背上,逐水草而居,平时射猎,战时凡力能挽弓者皆为战士。士卒不鞍而骑,军队不备粮草,驱牲畜同行,随时就地取得给养。

如从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北方民族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为视角来观察,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 在号称中国正史的“廿四史”中:专门或主要描述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的计有:《魏书》《北齐书》《北史》《周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与《清史稿》,共计10部;占总数10/24,约40%。

(2) 自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南北分治时代。

①十六国—东晋(316~420年,共104年);②南北朝(420~589年,共169年),五代—十国(907~960年,共53年),宋辽金夏(916~1274年,共358年,西夏、回鹘、吐蕃、大理等),总共684年,占据秦统一中国至清亡(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历史的684/2132,即约1/3。即便去除五代至辽金夏间重复计算的数十年,这一比例也基本没有变化。

在中国闻名世界历史的四大一统王朝(汉、唐、元、清)中,由北方民族建立的有两个,即元与清,从数量上,元、清居其二,占50%。从国家的强盛与世界影响来看,元、清两代是堪比汉唐盛世的王朝。从王朝延续时间看,元从成吉思汗建蒙古国(1206年)至明军攻入大都(1368年),共积162年。清从1644年入山海关至辛亥革命,共存在267年;元、清两代共计429年。与之相较,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一统王朝汉(公元前206~公元190年,共396年)、唐(618~907年,共289年)、元(1206~1368年)、清(1644~1911年)总计存在了1114年,其中元、清两代的时间超过1/3。

(3) 在其他重要朝代,北方民族事务也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汉之匈奴、西域、羌;唐之高句丽、突厥、回鹘、吐蕃;宋之辽、金、西夏;明之鞑靼、瓦剌等。

元朝的建立,就是北方民族从建立地方性政权到全国性政权的转折。成吉思汗的父祖与他本人的青年时代,蒙古与其他草原游牧部落均曾为辽金的属部。蒙古族从成吉思

汗起，历近70年时间，经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与世祖忽必烈五代君主，积其祖孙三代人之努力，终于统一中国，并使吐蕃、云南首次进入中国的版图。因此元朝不但是北方民族首次建立的疆域包括整个中国的政权，也是将我们前面提到的数千年来形成的农耕区与草原的相邻关系，发展成共生关系的重要时期。元代在为前朝编修历史时，将辽、金、宋均视为正统，就是这一观念的最好体现。因此今天我们可以讲，中华文明，既包括了以农耕为基础的从仰韶、龙山等文化发展起来的中原主流汉文化，也包括前面提到的以猗狁、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蒙古为发展脉络的草原文化。因此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论——是一个有充实内容的论断，这就是成吉思汗留给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遗产。

四、世界命运的改变——新时代的创造者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建立的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其国土东起朝鲜，西与地中海之滨的叙利亚、小亚半岛的拜占庭以及西欧为邻的鞑罗斯，北及北冰洋，南临印度洋。元代国土之辽阔，蒙汉等各族人民皆知。用蒙古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①。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上天降生成吉思汗，东起日出之地太平洋之滨，西达日没之处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人民，均为蒙元所治。

元代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这种记忆甚至在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南人知识分子中，也一直保持至元末。元末航海旅行家汪大渊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②而根本没有出过国门的王礼也写道：皇元“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③。除知识分子之外，普通市井小民尽管并不清楚自己国家都城元大都的来历^④，但也意识到元帝国前无古人的疆域，在《事林广记》的一个元代版本中的〔大元皇帝〕条项下记：“际天薄海，莫非王土；开口〔辟？〕以来，提封之广，未有如今日之广也。”^⑤

人类历史上，不止一个民族建立过疆土辽阔的大帝国。如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建立的阿黑门尼德王朝（Akhmanids），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人建立的希腊亚历山大帝国，

①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卷十九，典章五十七，“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北京/天津：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② 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苏继庠校释本《〈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③ 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七，四库本。

④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园书院刻本元代增入的〔大元皇帝〕条下，记“奄有天下，混一南北，建国定都，以燕山府为大兴府，号称中都。山河之固，都邑之盛，宫室之美，前古之未有。美哉万世帝王，子孙之基业也。”《事林广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

⑤ 《事林广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

中国的汉、唐王朝，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近代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建立的海外殖民帝国与近代的俄罗斯帝国等。而蒙元帝国是文艺复兴时代以前，人类历史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其领土之广只有近代的大英帝国可与之相较。那么它在世界历史上有何意义呢？

半个世纪之前，韩儒林先生在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撰文提到：“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他还说：“这样东西畅通无阻的时代，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话，仍然没有过时。但不同的是，全人类步入了一个新时代——全球化时代。因此，时代给了我们机会，重新审视草原帝国的奇迹，探求成吉思汗这位草原英雄留给人类的遗产。

“东方”与“西方”几乎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永恒的话题。在13世纪以前，东西方虽然有着间接、继续的交往，但其历史与文明是各自沿着其固有轨迹前进的。蒙元帝国在欧亚草原方向，一直延伸到东欧；在西亚达地中海之滨，第一次使中欧与西欧人从踏上钦察汗国的国土起，使阿拉伯与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人从进入伊利汗国的国境起，就进入了这个辽阔的国度。这就大大便利了东西方各民族的往来。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东、西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继续的联系，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直接交往，来自西欧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臣普兰·伽尔辟尼（Giovanni de Pano Carpini）、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臣威廉·鲁卜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驻大都的主教蒙特高维奴（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福建泉州的传教士安德烈（Andrew），教皇的使臣马黎诺里（Marignolli）；来自摩洛哥的航海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ūta）；从大都赴伊利汗国的聂思脱里教徒、后来被伊利汗派遣出使欧洲，经黑海到达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罗马和巴黎，会见了拜占庭东正教总主教、教皇、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列边扫马（Rabban Sauma）、从东胜州赴伊利汗国，于1281年被推举为聂思脱里教派总主教，称为雅卜·阿罗诃（Yahbh-Alhah）三世，驻于报达城（今巴格达）的麻古思（Markos）等，均成为中外、东西交通史著述中常见的名字。而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马可波罗（Marco Pollo）。

马可波罗所描述的蒙古大汗统治的中国的繁荣与富足，吸引了许多欧洲王公、商人与航海家。由于15世纪时中近东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传统前往东亚的航路受阻，西方航海家不断努力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航海家选择了绕过非洲好望角的航线，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基于大地球形说，坚信从欧洲向西航行也能到达中国。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最终到达美洲，标志着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到来。而追根溯源，大航海时代肇端于马可波罗，起源于欧洲人对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元帝国的向往。

虽然欧洲人自古希腊时代起就知道地球是圆形的，但并没有能力从事跨越大洋的远航。正是因为蒙元时代中国的磁罗盘与火炮技术的西传，使海船的攻击力与防卫力空前

^⑥ 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收入《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87页

提升，并可在茫茫大洋中作地理与航向的定位，使只船片帆也具备了远航未知海域的能力。15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者的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正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由此，世界各地历史联为一体。而只有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上，才会出现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讲，成吉思汗和他开创蒙元帝国，拉开了人类全球化时代的序幕。

因此，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在认识到成吉思汗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壁垒的基础上，进一步看到了蒙元帝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拉开了人类活动全球化的序幕。在这一层意义上看，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是中国历史上堪比秦皇、汉武的明君，也是开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千年伟人。

《元朝秘史》文献学研究史概述

乌 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元朝秘史》这部古籍以其所载内容之重要、叙事风格之生动清新以及留存形式之独特等特征,受到多方关注,吸引人们不断地展开探索和研究。对于《元朝秘史》的价值,前人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的认识也在加深,而且更加实事求是。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曾经十分准确地指出:“《秘史》叙述着成吉思汗所出生的氏族,自由而奔放地绘出草原生活的图像,为推断12~13世纪蒙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如果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吸引史学家们的注意,那么也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保留下像《秘史》那样形象地详尽地刻画出现实生活的纪念作品。”^①《元朝秘史》不仅是蒙古人,也是整个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文化财富。

从学术角度来讲,《元朝秘史》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首先它是一部史书。书中的内容包括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迹,还有窝阔台在位时期的一些事迹。由于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当时还处在蒙古民族历史编纂的早期阶段,《元朝秘史》的整体风格呈现出较多的文学色彩,也可以说是文史不分。但是这并不影响它首先是一部史书的性质,书中的内容和书名(无论是“脱卜赤颜”^②还是“秘史”)都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一点。书中大部分素材来

①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焱汉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5、16页。

② 《元朝秘史》的原文,本为蒙元时期宫廷用畏吾体蒙古文所修“脱卜赤颜”即“国史”的一部分。脱卜赤颜从蒙古汗国时期开始修纂,中间可能一度辍修,不过至少还是修到了元文宗朝。《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载:“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同书卷一五《世祖本纪》十二载:“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同书卷三六《文宗本纪》五载:“命朵来续为蒙古脱不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同书《虞集传》又载:“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历史是其中最前面的部分,属于早期脱卜赤颜。脱卜赤颜是皇家秘籍,被深藏宫中,外人不得窥见。《元史·虞集传》还载:“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许有壬《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国史曰脱卜赤颜,至秘也。”(《圭塘小稿》卷十,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清雍正二年抄本,第七叶背面)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九说:“元人有《秘史》……书藏禁中不传。”(文海出版社,影印清钞本,487页)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之后,脱卜赤颜落入明人手中。其面临的命运,依目前的一般看法是,当时为了培养蒙古语的翻译人才(通事、译字生),将脱卜赤颜中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事迹部分选作教材进行加工,制成了一部特殊形式的汉籍,即经过汉字音写原文、加注旁译和总译、题写书名,形成了现在的《元朝秘史》。

自世代口耳相传的口头作品和当事人的口述，而在尚无文字的时代口头作品总是借助便于记忆的韵文来维持，因此其文学色彩较浓的现象在所难免。书中也存在一些诸如史事年代错乱、历经几年的事集中于一年记述、人物记载偏离史实和脸谱化等弱点。但是“这些缺陷并不足怪，这无非是各民族早期历史编纂中常见的现象”。参与《元朝秘史》创作的人们“毕竟是一些草原史家。他们没有受过中原封建史官那样严格的训练，没有封建史学的先例可援”^③。

《元朝秘史》可以称得上是古代蒙古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在书中可以看到古代蒙古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生动记录，及其社会组织发展和变化的情形。书中还提供了古代蒙古社会结构包括行政、军事建制方面，以及游牧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珍贵资料。书中所反映出的古代蒙古的社会心理、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也成为相关方面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元朝秘史》又是一部优秀的蒙古文学经典作品。书中有大量的韵文、俗语，人物记述多采用文学描写，经过了艺术加工。反映出当时的蒙古人作为草原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学成就，同时也反映出当时蒙古史家的历史倾向性，“在某种意义上，《秘史》的文学描写是代替评论的”^④。

《元朝秘史》所据原文是以畏吾体蒙古文写成的，记写的语言是古蒙古语，因其篇幅和纯蒙古色彩，成为古蒙古语独一无二的典范文献，也是蒙元时代唯一的长篇蒙古语作品。它是真正用蒙古语思维、用蒙古文撰写的。一方面，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蒙古语词语，而现在其中有些词语已经消失，有些词语已经转义。另一方面，书中保留了不少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现象，现在有些也已经消失或发生了变化。这些词语和语法现象被脱卜赤颜使用和记录下来，并通过《元朝秘史》的注音和汉译得以基本准确保全原音原义，这为后人了解、研究古蒙古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权威参考。

经过长期广泛的、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元朝秘史》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秘史》学”。到目前为止，《元朝秘史》的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本文拟就这方面的情况进行梳理，循其主要发展脉络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研究一部古籍，首先离不开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文献学研究是最基础的研究，对于《元朝秘史》这样一部特殊形式的史籍，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扎实、到位的文献学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就会缺少质量上必要的保证。冠以《元朝秘史》之名的这部古籍，成书已经六百多年，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回顾这一历史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划为三个阶段来总结和介绍。

③ 参见亦邻真（Y. Irinchin）《〈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Mongγol-un Niγuča Tobčiyān, sergügelte*），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绪论《〈元朝秘史〉及其复原》。

④ 参见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一书的绪论。

一、早期文献学研究

节选元代脱卜赤颜的某些部分进行加工，制成特殊形式的汉籍，其过程本身就带有研究的性质。因此，“《秘史》的研究，应当从汉字音写本开始算起”^⑤。汉字加工本的音写规则、用字规范十分严密，照顾了蒙古语音和谐律、舌尖颤音、词首轻喉擦音、音节末辅音等多种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处理，选用音译汉字时兼顾词义^⑥。旁译不只是单纯给出词义，还使用一套标示词法形式的特定用字，使原文的语法意义更加明确^⑦。经过这样加工的汉字本，不仅便于当时的学生学习掌握蒙古语，而且在客观上为后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信赖度相当高的参考依据。

明代，《元朝秘史》的影响有限，这可能与它作为教材的性质有关。除了一些简单著录外，所能见到的反映只在于个别书籍的引用中，而且多为只言片语。例如：

《大明一统志》记：“不岫罕山。斡难河源出于此，昔有苍白狼遇惨白鹿于此山，生子名巴塔赤罕。后为蒙古部，即元氏之祖。迭里温孛答山。近斡难河，即元太祖铁木真生处。……阔阔纳活儿海。元太祖为诸部推戴，称帝于此。”^⑧这些内容后来为峨嵋山人《译语》直接利用^⑨。

《万姓统谱》记：“按《元朝秘史》云，元朝的人祖是天生苍色人与惨白女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水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生一人，名为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马察。至十二世生孛端察儿，十三世生帖木真，以孛儿只斤为姓，是为元朝太祖。始太祖帖木真丙寅称帝于斡难河。”^⑩

《三才图会》记：“元按，《元朝秘史》云，元朝的人祖是天生苍色狼与惨白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水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生一人，名为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马察。至十二世生孛端察儿，十三世生帖木真，以孛儿只斤为姓，是为元朝太祖。始太祖帖木真丙寅称帝于斡难河。”^⑪

⑤ 参见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一书的绪论。

⑥ 例如，阿不^ᠤ刺^ᠤ浑^ᠤ（aburaqun），亦^ᠤ列^ᠤ坤^ᠤ（irekün）；^ᠤ列^ᠤ（re，比较：列^ᠤle）；豁^ᠤ儿^ᠤ臣^ᠤ（horčīn，比较^ᠤ豁^ᠤ儿^ᠤ臣^ᠤqorčīn）；以小字“勒”“惕”“卜”“黑”“克”“尼（你）”等分别表示音节末的辅音l，t（d），b，q，k（g），n，等等。

⑦ 音译与山、水、口、目等有关的蒙古语词汇时，一般会选用带有山、水、口、目等偏旁的字。例如，阿^ᠤ兀^ᠤ刺^ᠤ（山），沐^ᠤ连^ᠤ（河），亦^ᠤ咥^ᠤ周^ᠤ（吃着），兀^ᠤ瞻^ᠤ（见）等等。参见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初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雕版印行，后收入《励耘五种》，再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⑧ 《大明一统志》卷九十《鞑靼·山川》（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明万寿堂刻本，第二十七叶背面至第二十八叶正面）。

⑨ 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218、219页。

⑩ 凌迪知《万姓统谱》卷首五“元”，《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17册，266页。

⑪ 王圻《三才图会》人物卷三《元世祖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32册，499页。王圻的《稗史汇编》卷十六《匈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787页）又一次提到《元朝秘史》，谓：“匈奴之国，其种有五。一种黄毛者，乃山鬼与牦牛所生。……一种乃塔巴亦罕（巴塔赤罕之讹）之种。《元朝秘史》云苍色狼与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称大蒙古。”

《万历武功录》记：“按元之先，苍色狼与惨白鹿配，度腾吉思水，至斡滩（难之讹）河源不儿罕山，生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马察，至十二世曰孛端察儿，始大。……也速亥生帖木真，以孛儿只斤为姓。”^⑫

可以看出，所引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元朝秘史》第1节，即有关成吉思汗先祖起源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万姓统谱》中，《元朝秘史》所述元朝的人祖被从天生“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换成了天生“苍色人”和“惨白女”。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摘录。

进入清代，《元朝秘史》的流传和研究逐渐有所活跃。除了传抄和一般著录之外，研究成分更重的成果相继问世。

清初，孙承泽抄录《元朝秘史》十二卷本之续集两卷的总译部分，收入《元朝典故编年考》第九卷中，并写有简短的序文，指出全书“盖其本国人所编纪者”，可以“补正史之所不载”^⑬。他的这番话被认为是“标志着中国乃至全世界批判地科学地评价〔《元朝秘史》〕原文的开端”^⑭。《元朝典故编年考》后来被选入《四库全书》政书类，《四库全书总目》“《元朝典故编年考》提要”论及《元朝秘史》，虽然说其“所记大都琐屑细事，且间涉荒诞。盖亦传闻之辞，辗转失真，未足尽以为据”，但还是承认“然究属元代旧文，世所罕睹”，“与正史颇有异同，存之亦足以资参订”^⑮。

《四库全书》并没有收入《元朝秘史》，只是在未收书目中为其保留了阮元所写的提要。该提要说：“国语旁译，记元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最为详备。……如是编所载元初世系，孛端察儿之前，尚有一十一世。太祖本纪述其先世仅从孛端察儿始。诸如此类，并足补正史之纰漏。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⑯

之后，万光泰利用一部十二卷本的总译部分，于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改编完成了《元秘史略》。在跋文中他首次使用了“节”和“总译”的术语。《元秘史略》的刊行者杨复吉写有一篇简短跋文，提到书中一些内容“若王罕之大有造于元太祖，孛儿帖之见掳于脱脱阿，沉白、忽必来等之战绩，《元史》俱不之载”，并分析其原因为“讳之乎，抑采缀有所未及也”^⑰。

充分注意到《元朝秘史》的巨大学术价值的是钱大昕。他在《跋元秘史》中评论了该书独特的史料价值，说：“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元〕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作为论据，文中还对照《元朝秘史》举出了一些《元史》“未详”“不书”“大误”“俱倒复

⑫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40页。

⑬ 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台北：文海出版社，第九卷，487页。

⑭ 参见柯立夫（F. W. Cleaves）英译本《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的导论。

⑮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701页。

⑯ 《四库全书总目》，下册，1859页。

⑰ 杨复吉《元秘史略》跋文。跋文又谓：“丁未暮春假知不足斋珍藏写本，阅竟亟录之，以广见闻。”见《史料丛编》，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47叶。